

（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）

本期目录

【恐怖岁月】	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	陆伟国
【悲剧人生】	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自杀之谜	佚名
【亡灵祭坛】	遭遇遣返的资本家父亲	王宗禹
【史实辨析】	评舒声对《抢救记忆》之评（下）	王复兴

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浏览，网址为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。

【恐怖岁月】

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

• 陆伟国 •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学。可是，提起我的大学同班同学，真的是感慨万千，千言难尽。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1962级的学生。入学报到时，全班30位同学。到1968年秋离校，是26位同学。离校以后，更有好几位同班同学离开了人世，已经确知的就有：陈振来、米受光、薛余才、田永祯、王松珉、夏宗勇同学。有几位同学，从离校后就一直联系不上，至今毫无音讯。还有几位同学，近年来也已失去联系，情况不明。现在回过头里看，我们在校的六年，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内容。就以我们班的四位同学为例，他们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那是一场怎样的浩劫。

一．殒命武斗场

当时人民大学师生分裂为“人大三红”和“新人大”两个群众组织。随着文革的深入，两派的争斗日趋尖锐，不但各自划分了地盘，成立了武斗队，实行武装割据，而且相互间不断地摩擦和冲突，最终失去控制酿成大祸。1968年5月22日，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，在人大校园爆发。这是文革期间北京高校唯一一场面对面对面刺杀的血战。

这场武斗，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。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，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、拉铁丝网、修筑工事。一到晚上，聚光灯四处照射，就跟战场一样。那天挖沟时，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，对方又再掀过来。掀着掀着，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。从泥土对扔，到棍棒交加，直到出动“武斗队”拼杀。

我是“三红”这边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在楼下，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。突然，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，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：“西面打起来了！西面打起来了！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，不知道啊？”“怎么啦？”我们问。“打起来了！都打起来了！”他

使劲地嚷着，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此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“武斗队”从总部大楼出发了。我们这才知道，事情闹大了。

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、手持长矛，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“增援”，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，就像踩在心上，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。那步伐之整齐、神情之坚决、训练之有素，堪与正规部队相比。可是，那是上什么战场？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，这一去，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。我们想跟着去，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。我想也是，我们跟着去，只能给他们添麻烦、增加负担，所以没有坚持。

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（当时的新图书馆，是“新人大”的总部所在地，现在叫图书馆东馆）。往日的同窗，就这样手持长矛，面对面，作生死拼杀，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就失去了3条生命，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。听说，他身上被捅了7个窟窿（也有说是中了11枪），其中一枪刺穿心脏，当场身亡。听说，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，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。

当时，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。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。很快，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。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，身上血迹斑斑，脸色冷峻，好像都很坚强。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。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“武斗队员”护送，以防对方途中劫持。护送人员中，还有一位黑色长裙的女同学，引人注目。

这一夜，开始是异常的寂静，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。到半夜时分，突然，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“国际歌”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。我们一听，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，个个都面面相觑。后半夜，传来话说，“有你们班的一个”，我们大惊。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，叫陈江，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。我们还都抱着希望，不敢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，总觉得不会是他，但愿不是他。大家都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得到了确凿的消息，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呀！

虽然被分成两派，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。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，很朴实、很正派，为人做事认真负责，从不张扬，体格也并不健壮。尤其是，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，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。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，不是一般的表现好，是会有机会上人大的。他平常很谨慎、也很到位，有什么事情，既不冲在前面，也不落在后面。虽然我们班同学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，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，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。对这场“文革”，他更是格外的谨慎、格外的认真。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？他并没有参加“武斗队”，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想，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，在面临风险的时候，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，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，尽管手无缚鸡之力，尽管满心的不愿。

几十年后，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。那天的情况是，“新人大”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，装备、训练、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。第一线的“主力部队”交锋几下，很快就顶不住，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。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，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，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，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、拖把就跑过来。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。而“三红”这边提前有所准备，在装备、训练、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。双方在实力上，明显不在一个档次。

由于“新人大”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，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。当“三红”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，现场发生混乱，指挥失灵。有的

见势力不妙就往后跑，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，有的心里还想着“坚强勇敢”的人还在往前冲。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，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，就被无情地刺上了。

只几分钟的时间，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。等“三红”稍有后退，这边的人大喊：“刺死人啦！快救人啊！”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。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，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，满脸满身都是血，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。

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。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，说已经不行了，不用送医院了。等到了积水潭医院，医生确诊已经去世。这时，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、满脸是泪。所有在场的人，都哭成一片。谁都没想到，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。

在医院的太平间里，陈荣祖躺在那儿，满脸的血污，紧闭的双眼，那毫无血色、苍白得吓人的脸，那浸透了血渍、被刺破了的衣服，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。也说不上整容，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。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，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。他的衣物还在被“三红”占据的东风三楼，不敢过去拿。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，给他穿上。临离开这个世界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。

更痛心的是，他家在苏北农村，景况十分贫寒。而且很早就结婚了，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。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，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，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。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，在住宿的楼里，一个门、一个门地拍打着，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，呼天呛地，悲痛欲绝，寻找着她的丈夫，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。她，一个农村妇女，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，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。整整一夜，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到了积水潭医院，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，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，撕心裂肺地哭叫着，翻开丈夫的衣服，颤抖地抚摸着 he 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，几次昏死过去。见者也无不落泪。

事后，因为是群众组织，没有经济能力，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。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，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。最后，我们班的李原好、王松岷、朱婉珍、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。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，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，磕头嚎啕大哭。几个同学把她扶起，也都哭成一团。车开了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，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。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，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，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、泪水盈眶。

在这一边的我，虽然不能为他送行，几十年来，他却始终在我心上。直到退休前，我给每个班讲课，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，都要讲这件事，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，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，好好学习、努力工作。1990年代的一天，我讲完后，下课时，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讲的，就是我的叔叔。”

直到现在，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，总在想，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，可是他呢？他在哪儿呢？我还曾试图寻找过他的血衣，听说是保存在田永祯同学那儿，可惜田永祯同学也已离开了人世，就无从继续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，我终于找到了陈荣祖同学的儿子陈东林，并取得了联系。在经历了当年天塌下来一样的苦难之后，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他坚强地站立了起来，如今是地方税务局的一名干部，成家立业，生活幸福，还有了一双儿女。

二. 相互抓捕

两派的仇恨，不但表现在武斗上，平时还多次相互抓捕。1967年11月12日，“新人大”抓走了“三红”成员王昆顺，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恶劣先例。于是，双方在校内外都想方设法伺机抓捕对方人员，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。

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，一旦被对方抓去，结果都是很凄惨的，至少是要挨打的。打的轻重，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，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、职务；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，即所谓“罪行”的大小；以及“认罪”的态度。至少要打得求饶，发表“反戈一击、弃暗投明”的声明，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。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，签字画押，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。此时的“反戈一击”，名为重新站对立场，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实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，被认为是最可耻、最卑劣的，比走资派、黑五类还要坏。

而且，如此这般之后，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，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。这样回来以后，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，而且精神压力很大，抬不起头来。同一派的人，也有看不起他的，影响队伍的团结。看着被抓去的人，如此凄凄切切，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，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。所以这种做法，是很卑劣的。

被放回来的人，有的就此消沉，不敢再干。有的就一反常态，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，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，更为了复仇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会更加无所顾忌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，或豁出去拼命，在争斗中不顾生死、冲在前面。

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，在“文革”时的特有表现。当然，这样对待被抓人员，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、满门抄斩，又要“文明”多了。

这种事竟也落到了我们班同学的身上。

一次，我们系有几个“三红”同学上街去，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，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：柏承庆和张春，结果被对方武装巡逻的大卡车碰上。对方看见是“三红”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，十几个人猛扑过去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就公然抓人。柏承庆个子小，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，没引起他们注意。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，躲过一劫，得以回校报告。而同去的张春则没有那么幸运，被对方抓走。

张春被抓走以后，我们都很担心，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。

可能是集中交换“俘虏”，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。张春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。那天，忽听门外喊：“张春回来了！”我赶紧过去，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。只见他紧闭双唇，神色怏然，脸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，看来被打得不轻。扶他时，碰到哪儿，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。躺下后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。我们看着都很心疼，情绪也很激动。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“三红”的小组负责人，因此而多挨了几下。他是被抓到北三楼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，而北三楼正是两年前我们住的宿舍。

当时，有一位我系“新人大”造反团的同学（从对方“新人大”造反过来的同学，不直接加入“三红”而是单独编队）看到这情景，气愤得不得了，径直跑到总部大楼，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。通常打对方人员，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，而且即使是外系的，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。这次，他可是不管这些，上去就打，可见已气愤至极。

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。随后“三红”派来了一辆救护车，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了北医三院疗伤。这之后，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，我们也再没提起过。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，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。毕业分配，他去了东南沿海的一个乡镇。近十几年，只听说他回到了河北迁西老家的一个工厂，却再也没有联系上，很让我们牵挂。

两派也由此积怨日深，愤恨难平。即使已经到了1968年7月，工宣队进校掌管了大权，就要“大联合”了，“三红”的一些人却依然要抓人报复。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张春被“新人大”抓去打，过，“三红”这一面的就要反过来抓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同学报仇。

由于对方的同学已陆续搬回原宿舍，反而更好抓一些。名单都定好了，先是要抓许昭忠同学。我们班“三红”的柏承庆同学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况，出于同学情分，十分着急，通过朱婉珍同学设法转告了过去。许同学闻讯赶紧避开，得以逃过一劫。但我方“三红”依然抓走了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另一位同学，即我们的班长李原好。在李同学回东风三楼不久，一个晚上，已九点多，他被三四个蒙面人从床上拖走，两手被绳子捆住，头被蒙上衣服，拖到了“三红”总部的新教学楼地下室。

到了那儿，眼睛被换成黑布蒙上，就立即遭到审讯毒打。边问：“你为什么参加‘新人大’不参加‘三红’？你为什么保郭影秋反对孙泱？”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，打得他两眼冒金星，鼻子、嘴角都流出了血。打人者又喝道，要他跪下，他不肯。上来一个人猛踢一脚，击中右腿，当即就造成骨裂脱臼。李同学“啊”的一声惨叫摔倒在地，打人者还不放过，又接连几个小时的皮带抽、棍子打，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多。这时的李同学只能躺在地上呻吟，脸上阵阵抽搐，浑身遍体鳞伤。一天一夜没吃没喝，屎尿都拉在身上，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还留下了后遗症，至今行走不便。

在“新人大”同学的努力下，解放军、工宣队主持正义，对“三红”的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。此时的他浑身伤痛、两眼看不见东西，已无法行走，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把他背了出来，上了救护车，送到了医院。同班的两位“新人大”女同学陪同前去，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天里，对李同学精心照料。在这时又一次显示出人性的光芒，同学之情，如同手足。

这事在当时我并不知道。事隔几十年之后，李原好同学才告诉了我详情。而那位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，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。

三．摧落的花

1967年初，人大的两派由说不到一起，发展到住不到一起。“新人大”一派撤离原住地，往北集中。“三红”的留在原地。我原本不是“三红”的，当“逍遥派”回老家住了几个月，等回来一看，也不知那些同学上哪儿去了，就留在原宿舍，成了“三红”的了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楼（东风三楼的三层楼），她们女生在二楼。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，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。

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，我不能更多地叙述她的事情。但想说的是，这决不是通常“移干柴近烈火、无怪其焰”的老套故事。因为她和一位外国留学生交了朋友，有所往来，被留学生楼的管理员告发，竟然引起了安全机关的关注，怀疑她“向国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”，下令对她和她的男友，两个都要抓，尽管她本人是归国华侨、而那位留学生还是某国左派组织负责人的后代。

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，以“革命群众”扭送公安部门的办法来进行。这个“任务”由我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了。他们暗暗盯梢，在这位女同学进到留学生宿舍后，等到晚上再一拥而上，砸门而入，把她从衣柜里拖了出来。在所谓“扭送”的时候，她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，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，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，几近裸体，残忍至极。

在被公安部门拘押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，没有审查出所谓“向国外泄露国内文化大革命情况”的问题，她又重回学校。我下去看她的时候，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，语言很平静。我没有劝慰她，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。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，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。她能这样地面对，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。

她还告诉我，在被抓之前，她外出进城看她姐姐时，已经被多次盯梢。她都已经认出盯梢的人，就是我系低年级的某个自以为有“公安工作遗传潜质”的人。在多次的被盯梢中，她也学会了在街上走路时，从橱窗看身后的人影，再突然回头反方向走，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儿、不知所措。

这个低年级同学当“特务”的伎俩实在是很不成熟。她说，有次她发现后面有盯梢的，便临时突然上了辆公交车，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着上车而兜里却没准备买票的钱，便跟那售票员吵了起来。她一看，又是这么回事，就立即下车，把那人甩在了车上继续跟售票员吵。

现在的人们，谁能想到那年那月，同学之间竟会演变成这种关系。或许，正是盯梢者几次挫败而心生怨恨，加重了后来对她围殴的凶残。

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，这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“监护”。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，可也是一把血泪。那天，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，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。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、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，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。那时，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。在湖南社教的后期，我和她在一个大队，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。虽说是同一个大队，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，很少碰到。不像北方平原上，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大队。

离校十多年后，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，还见了次面，她美丽依然。我们班的同学中，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。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。“文革”前，她深情地对我说过，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，第一次听到“歌唱祖国”的乐曲，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，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，都抑制不住，从心底里呼喊：“回家了，回家了！”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，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、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。

她的父亲是国外某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负责人，为了世界革命，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撇家舍业，难以顾及亲人，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，最后却是这个结果……有很多话，在此，我不便于说。但是，她的遭遇，太不公平、太不应该、太伤人心。

她不一般的身世，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。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。这几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，寻找过她，始终没有结果。我说，让她静静地生活吧。有相当一部分“文革”过来人，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，远离曾经的人，远离曾经的事，默默地疗伤。我们能理解。我祝她幸福，祝她平安顺利。

〔作者：陆伟国，1945年生，上海市人，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。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。〕

□ 根据《风霜雨雪忆年华（1962—1970）》（漓江出版社，2012）整理而成。

~~~~~  
【悲剧人生】

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自杀之谜

· 佚 名 ·

历史嘲弄了他们，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清，悲剧是怎样发生的。其实，从范长江离开《大公报》那一刻起，悲剧的帷幕就已拉开，一切都不可避免。

在范长江的生命中，记者的身分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。在中共当代新闻史上，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，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、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“红军”的人、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。同时，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，解放日报社社长，新闻总署副署长，人民日报社社长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，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，国家科委副主任，全国科协副主席、党组书记等要职。

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——范长江新闻奖，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。但是，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，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。

◇ 吹鼓手变成苦劳力 范长江被专人监管

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；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、两河相交的小村庄——芦庄，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“五七干校”所在地。

“五七干校”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。在芦庄村的东北角，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，因年久失修倒塌外，其他房子仍然存在。据史料显示，1966年5月7日，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《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》后，给林彪写了一封信（简称《五七指示》）。在这个指示中，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“一个大学校”，“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文化，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，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”，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“五七干校”诞生的历史背景。

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、建立的。1969年3月，被定性为“反革命”、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，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、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。当时，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。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，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。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，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。

当时，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。由于是第一批到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，晚上搞“斗私批修”活动。

与众不同的是，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，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，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，平时除集体活动外，不准与外界接触，不能自由活动，否则非打即骂，或者开批斗会。所以特别引人注目，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#### ◇ 虎落平原被犬欺 名记者遭大粪泼身

倪炳银，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，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。

40多年的基层经历，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。这次采访中，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。他说，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，其中就有范长江。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，所以格外引人注目。当时，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，偏黑，稍瘦，很朴素。当时他定的是“反革命”罪，他的名字基本上被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所代替。

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。一班是300人，搞劳动生产；另一班是200人，搞基建。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，主要是建房子。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。1969年8月份，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，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。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，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，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。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，趑趄着从地上爬起来，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，继续搬送砖头。

倪炳银告诉记者，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、20亩菜地。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、累活干了，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。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，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，且又上了年纪，身体状况也不好，一次挑大粪时，腰还没伸直，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，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。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，连衣服也不让换。就这样，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，一直干到歇工。

#### ◇ 批斗会上被拳打脚踢

在确山五七干校，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、脏活、累活，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。

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，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，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。尚大福说，范长江除干苦活、脏活、累活外，主要是行动不自由，处处都有人跟着，有空就受批斗。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，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。其他人可以买肉吃，而范长江不能。当时，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，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，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。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，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，同时还少不了挨骂、挨巴掌和拳头。



每到夏季，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，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，而范长江不能。

每天晚上，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“斗私批修”，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。范长江站在那里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。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，发表对“反革命”的仇恨、对“最高指示”的忠诚。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，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。

1970年10月22日晚，夜已经很深了，但像这样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批斗会一直在持续……

#### ◇ 难耐巨大的压力 最终投井自杀

长期被限制自由、沉重的思想包袱，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，投井自杀。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，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，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、直径为1.4米的水井。

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，1970年10月23日，早晨起来，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，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。“当时没有叫我去找，但听去找的人来说，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，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，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。”

今年75岁的李长俊，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，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。他回忆说，“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，别背那么重的思想包袱，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。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。”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“大官”的死，李长俊惋惜不已。“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，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，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，草草掩埋了。”李长俊说。

据说，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，两边用木板衬着，把尸体放下去，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。中共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间。而死去的范长江，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。就这样，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。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，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。

1976年春天，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。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，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，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。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，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。

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，土质非常松软，没几锹就挖出来了。打开塑料布后，人们都惊呆了！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。人们不禁潸然泪下！

1978年12月27日，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。邓颖超、聂荣臻、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。1990年，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“范长江新闻奖”。

~~~~~

【亡灵祭坛】

遭遇遣返的资本家父亲

• 王宗禹 •

我的父亲王桂芳，后改名王馨圃，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照旺庄乡大陶漳村。我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，家里有几亩地和7棵梨树。父亲弟妹共六个，父亲是老大，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祖父靠教书为生，家里没有人种地，土地就租出去了。父亲从小读了九年书，十几岁就到东北吉林市一个水果店学徒。后来回到老家娶了我母亲，我母亲家是本县望岚口村的。我姥爷后来到北京做小生意，开了个肉铺。姥爷家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儿，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男孩。姥爷把我的父母叫到北京继承了他的肉铺，父亲没有一直卖肉，而是与别人合伙开了个饭馆。再后来他自己独立开了个粉坊。

龙口的粉丝是很出名的，父亲找了几个胶东的有手艺的老乡一起做粉丝生意。在西直门外租了一个院子，置办了一些工具，石磨、炉灶、牲口、大车等，取名宏兴粉坊。父亲既是经理又是会计。凭着这个小买卖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，母亲先后生养了我们七个孩子。我行四，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哥哥，下面有三个妹妹。

从1930年代到北平解放，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着，家里孩子多，生活并不富裕，解放后，头几年也没有什么变化，一直到1956年，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，也就是公私合营。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派人来把所有的资产折算成货币，称为定股，然后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领取利息，称为定息，规定领取十年，之后全部资产就归政府所有了。

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说了算，我家的定股是1573元。我家每个季度可以到银行领取19.66元的定息。按照规定，定股达到1500元就算资本家，1500元以下是小业主。于是父亲就有了资本家的身份。一方是政府称为公方，一方是资本家称为资方，厂子由政府派人来当厂长，父亲被安排当副厂长，后又降为生产股股长。同时还安排父亲做了海淀区工商联主任。父亲的月工资是62元，工商联主任没有薪水。

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父亲既是工厂的当权派（虽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权）又是资本家，首当其冲就成了斗争对象，被斗，被打，被剃头，被抄家。后来有传言，要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赶出北京，父亲是资本家，算是民族资产阶级，属人民范畴，似乎不在此列，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脱厄运。

厂里的一伙人告知父亲已经被列入遣返名单，9月9号离开北京，押送回原籍。厂里送来一些草绳捆绑行李用。户口被提前办理了迁移手续，我姐姐早已参加工作，在新疆石油系统的勘探队，她的不到两岁的儿子在我家里；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工作；二哥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；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；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初一；二妹上小学，还有一个小妹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我在成都的叔叔（他没有孩子）。户口本上的7个人只留下我一个，家里的房子被封了，我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北京一个远房舅舅家。

9月9号厂里来了一辆大卡车，下来一的伙人为首是一个叫胡全发的，要押送我们这一家人去火车站。街坊四邻不少人来围观。胡全发恶狠狠地推了父亲一把，要他跪下，父亲顺从地跪下，又叫我爷爷也跪下，爷爷也跪下了。胡全发对父亲翻起了旧账说，你叫我们工人干活你在一边掐着表，还摆资本家的派头。你算什么东西！然后叫我母亲去找白布和笔墨，然后对父亲说，你写！父亲说，写什么？姓胡的说，你自己说，你是个什么玩意？看着胡全发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此时父亲想什么我完全能猜到，他怕挨打，尤其是当着老父亲，妻子儿女和街坊四邻的面挨打，那将是一个极其不堪的场面，他唯一的选择是顺从。父亲沉吟了片

刻说，我是个“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”，行吗？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，胡说，行，你就这么写。于是父亲在白布上写了“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”，母亲被命令把白布缝在了父亲的后背上。又在另一块白布上写了“老资本家”，缝在了爷爷的后背上。

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不敢亲近的人，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，有时我在外面和玩伴儿打架，人家找到家里；或者因为玩皮球打碎邻居家的玻璃，我还没少挨父亲的揍。加之父亲资本家的身份使我们做子女的在学校受到歧视，心里也有些怨恨，有时还会幼稚地想，为什么父亲要做资本家呢，为什么不做工人呢？

同时我也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觉到父亲对我们是疼爱的，他是个非常本分、待人厚道的人，辛苦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。此时父亲要走了，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跨了两步到他面前想说两句什么，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喃喃地说，回去好好的。父亲说，我知道。我还想说，以后我回去看你，没说出口，胡全发等人就催着走。父亲走了，被人押着，母亲，爷爷，还有妹妹抱着我的外甥，一同往外走，街坊四邻让开了路，我看到父亲蹒跚地走，后背上有一块飘忽的白布。没想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！

一家人到了火车站，一伙红卫兵检查行李，一辆准备托运的自行车被没收了，捆好的行李也被打开，几件旧绸子被面改做的棉袄也被没收了。

农村老家还有几间破败的草屋被生产队用作仓库，腾出来了。父亲下地干了几天农活便病倒了，先是吃不下东西，后来出现腹水，肚子像鼓一样，在家里躺了几天越来越厉害，母亲向生产队要了一辆马车送到了十几里地的县医院。家里剩下14岁的大妹燕鸣和12岁的二妹燕南，还有70多岁的爷爷以及不到两岁的外甥晓葵。燕鸣每天下地干活，燕南在家里做饭，照顾爷爷和外甥。

父母走了多日没有消息，当时没有电话和任何通信手段，燕鸣不放心走着去了县医院，得知母亲已经送父亲去青岛了。我不知道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怎样把父亲送到青岛的，后来听母亲说青岛有个远房亲戚帮着把父亲送进了医院，到医院看病还要报家庭成分，那个亲戚还帮忙谎报了父亲的成分。医生开始说是肝炎，后来又说可能是肝癌，没办法治，你们走吧。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大陶漳村。

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，清醒时说想吃葡萄，本家叔叔（王桂秋）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地到外村找到了葡萄。父亲吃到了葡萄，但是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11月28日父亲口吐鲜血撒手人寰，是年55岁。

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。

□ 原载《熊窝》网站

~~~~~

#### 【史实辨析】

评舒声对《抢救记忆》之评（下）  
——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

• 王复兴 •

（上接 z k 1 7 0 7 c）

#### 四、关于新北大的反左

舒声否认北大文革中曾存在过反左的倾向和潮流，他在文中说：

该书（指《抢救记忆》）说：“聂元梓的最大错误，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，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，反陆平，反彭真，反工作组，反上海市委，坚决批判资反路线，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，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”（130页）。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，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。该书还说：“当年聂元梓、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、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，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，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“走资派”，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“极左派”；不是反右，而是反左。它属于人民的文革。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。”（191页）更是罔顾事实，对聂元梓、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。事实上聂、孙和校文革在反“走资派”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，……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《新北大》大量刊登“揭发”“批判”党和政府、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……

我对舒声以上引述笔者的观点和史实仍然坚持，因为这是历史事实。笔者仍坚持聂元梓的最大错误，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，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，反陆平，反彭真，反工作组，反上海市委，坚决批判资反路线，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，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。这是聂的“最大错误”，但笔者并没有否认聂元梓、校文革在1967年1月以后仍犯有其他错误，舒声曲解笔者为：“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，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。”白纸黑字在这里，舒声怎可任意歪曲？笔者并不否认聂元梓、孙蓬一、校文革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师生在1967年以后曾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，批判“走资派”，校刊《新北大》曾刊登过“揭发”“批判”党和政府、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。但必须历史主义地看问题。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评判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，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，须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。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的1967年，全国人民狂热崇拜毛泽东，全国上下炮打刘邓司令部，这是大气候、大潮流。北大两派师生，包括聂、孙，也包括舒声，都只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炮打“走资派”，否则就是立场错误，“大逆不道”，甚至粉身碎骨。问题的关键点是，是否早在1967年，聂元梓、孙蓬一、校文革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广大师生曾经有过鲜明的反左倾向、反左潮流？历史的事实是：它确实发生过！存在过！这即是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。当年的聂、孙、校文革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广大师生反左，不仅是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，也是他们行动中的用力点，这样做在当时是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，因此人们非常注意策略和隐蔽性。人们在文革中的觉醒有个过程。早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，此一在北大文革中出现的闪亮的历史正能量，难道不应把它挖掘出来，做为益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展史的健康因素，予以认真总结吗？

应该如何历史主义地看待北大文革史中聂元梓的反左？王若水的分析很中肯，王若水在《聂元梓回忆录》的《序言》中指出：“聂元梓在‘文革’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、康生、谢富治等人的立场。她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，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，是和那些单纯的、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。尽管如此，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，不能不追随毛泽东参加“造反”。这是很自然的，不过到了后期，她也陷入困惑之中，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。”

关于聂元梓、新北大反左的史实，笔者在此处提出一个权威性的证据：江青于1968年初，多次批评聂元梓：“我让你反右，你偏要反左！”

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，宣布打倒杨、余、傅。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，北大聂元梓、马云龙参加了此会。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“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。”并批评聂元梓“我要你反右，你偏要反左。”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“3·22”林彪、江青的讲话。3月27日，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、余、傅的10万人大会上，江青讲话时，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反左是“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。”

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，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：“‘中央文革’提‘中央文革’的政治口号，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，当前不是右，而是‘左’。我们是有右反右，有‘左’反‘左’。现在是要反‘左’。”（引自《聂元梓回忆录》中《我的上诉书》）这证明当年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一定的自觉状态。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，是上下一致的，例如“新北大公社”的“红梅战斗队”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《评反革命极左思潮》，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。把“极左”加上“反革命”的冠词，是暗指林杰、关锋是吴传启后台。

今天反思文革，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，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。新北大坚持反极左，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聂、孙、“公社”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，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，也认识不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是毛。

当年新北大、聂、孙反左，集中表现在反吴传启，反王、关上。而舒声否认这点。舒在文中写道：“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、关锋等，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：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、关锋，就是反王关戚，就是反中央文革，就是反极左路线。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。”

舒声说新北大、聂、孙反王、关只是逻辑推理，不对，这首先是个历史事实。而逻辑上，当时不可能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、关锋，因此新北大、聂、孙的策略就是公开地打击王、关的马前卒吴传启，以此来抵制其后台王力、关锋。但这并等于主观上反中央文革（舒曲解笔者说“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”，笔者从未这样讲过），反而当时“公社”总部主观上认为是在“捍卫中央文革”，但客观上是反了中央文革路线的。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：

下面捋一下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。看看1967年3月下旬、4月10日、5月28日、6月1日、6月5日，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。3月下旬，聂元梓、孙蓬一、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，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、王力、关锋等人的问题，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“调查报告”以及王力、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。4月10日，聂、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，见了江青、陈伯达，向江青告状，告了王力、关锋。孙蓬一在接见时说，“我们认为王力、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、结党营私。”5月28日，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。关锋、戚本禹在座。陈伯达说，“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。”“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，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。”“你不要反吴传启了，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。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。”关锋则威胁说：“提醒你们，不要再犯错误，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。”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，会面不欢而散。这次“5·28”谈话十分重要，有几点值得注意：1、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“不要反吴传启了”；2、陈伯达以陶铸为例，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；3、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“合作”，隐含政治交易之意；4、如果聂不听话，不上他们那条

船，会怎么样？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：“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。”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。

“新北大公社”“除隐患”战斗队从3月至6月，多次向中央文革、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。6月1日，“除隐患”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。仅仅四天前，陈伯达刚刚于5月28日对聂讲过“你不要反吴传启了，更不要把我们（指中央文革）与他们（指吴传启等人）联系起来。”

在陈伯达眼中，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太不听话，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（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，一次是6月5日晚至6日凌晨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），陈狠整聂、孙，狠整“新北大公社”。

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，陈伯达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，对聂元梓、“新北大公社”说，“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，一定要垮台。”（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，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，威胁聂再反吴要“垮台”。）并且对聂、孙挥舞大棒，说“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。”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，权倾天下。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，是要把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压垮，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、反王、关、戚的浪潮。

在6月5日晚上陈伯达于人大大会堂讲话之前，在6月5日清晨，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，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。在这小范围的非正式场合，他说话毫无顾及，非常露骨。在《聂元梓口述自传》第十五、十六章中（引自博讯文坛，编者谢冀亮），聂元梓说：“当然，校内反对派的崛起，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、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，1967年6月5日，陈伯达对北大发难，对我发难，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‘6·5’讲话。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，他到得很早，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，他们谈了些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，就急忙赶往大饭厅，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。陈伯达对我们说，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，你们学校越乱越好，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。他还向群众讲话说，北大是‘一潭死水’，‘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。这样的指责，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！”

舒声认为“新北大公社”、聂、孙反吴传启不等于反王力、关锋。新北大反吴传启与反王、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。“学部红卫兵联队”吴传启搞形左实右，得到了王、关、戚、谢富治的支持。而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反对吴传启搞形左实右，也就打击了吴的后台王、关、戚、谢，并且会自然上升到直接反王、关、戚、谢。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，并已被大量史料所证实。

新北大聂、孙派与学部联队吴传启派之间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，笔者在下面择要捋一下：

1967年1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。《红旗》的林杰、学部联队的吴传启、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，拉一派打一派，支持高教部“延安公社”的卢正义夺权。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，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，因此遭到聂元梓、新北大坚决反对。而后王力、关锋严厉批评了新北大，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撤出了高教部。

1月15日，学部民研所的洪涛、刘郅在学部潘、吴支持下，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档案抢劫一空，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。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“抗大公社”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、刘郅等人扭送公安部，洪、刘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，第二天就把人放了，并

发表讲话封抢档案的人是左派，反过来把反洪涛打、砸、抢的民院“抗大公社”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。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，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。从此，民院“抗大公社”、郑仲兵与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成为反吴传启的坚定战友，并都对谢富治不满。

4月8日，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，地院“东方红”等高校的地派，在学部吴传启、洪涛等人支持下，于8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，对“新北大公社”学生实行武力清场，于9日凌晨3：30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。

4月11日下午，地院“东方红”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，闯入北大，大喇叭高喊：“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！”“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！”后来外校地派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，变哑巴了，并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。

“4·8”、“4·11”事件表明，由于新北大公社、聂、孙反对学部联队潘、吴一派到处伸手抢权，搞打、砸、抢，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，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。反新北大的后后就是王、关、戚、谢。

以上通过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，表明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反左，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，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、关、戚、谢富治。孙蓬一的“4·12”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。

“4·11”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，北大师生群情激奋，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“新北大公社”全体大会，并发表演讲。这个演讲是反极左、反吴传启的宣战书，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、关、戚。孙在演讲中说“真正的‘摘桃派’”“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，如高教部的‘延安公社’、中央统战部的‘红色联络站’。”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“采取拉一伙，打一伙，拉拉扯扯，勾勾搭搭，招摇撞骗，把手伸得很长很长，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。”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，排斥异己，到处伸手夺权。孙指出有人要“垄断、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。”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，他们不够资格、不够份量，而是指“大人物”王、关、戚“要垄断、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。”

清华“井冈山”蒯大富、北航“红旗”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“新北大公社”聂元梓、民院“杭大公社”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、洪涛，是持观望态度。到了5月，老蒯、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启的行动。其实所谓的“天派”、“地派”并不是阵线很清楚的两派，地院“东方红”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，被人当枪使了。真正对立的两派，是派中之派，一派是学部联队、一派是新北大（口头叫法）。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“红卫兵联队”、洪涛控制的民研所“红色联络站”、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“延安公社”、谭厚兰控制的师大“井冈山”。他们听命于《红旗》的林杰。这个小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，口号、行动都很左，有强烈的排他性。他们到处伸手抢权。一旦有什么冲突，王、关、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。新北大这派有：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“新北大公社”、人民日报“井冈山”王若水、中宣部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阮铭、民族学院“抗大公社”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“大庆公社”、中央音乐学院的“北京公社”、北京轻工业学院的“红鹰兵团”、北京外语学院的“红旗公社”等。这派的共同特点是：反极左，反吴传启，反王、关、戚，对谢富治强烈不满，对“二月逆流”的几个副总理“一批二保”，反对打倒。坚决保周（周恩来）。新北大当时成了反极左、反王、关、戚的中心。新北大派在1967年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（此时清华“井冈山”、北航“红旗”也参加了进来），极左派就全线震动，王、关、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，施压无效，于是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，陈伯达在6月5日凌晨与深夜，两次针对北大讲话。6月5日之后，北大“井冈山”一派出世。当年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师生反吴传启，反林杰，反王、关、戚、谢，主要是在校外，

而不是对校内，是层层向上，矛头向上。斗争方向是反极左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当年聂、孙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，以进攻态势反吴传启（明反），反王、关、戚（暗反）。

舒声能否认以上的大量史实吗？

聂元梓、孙蓬一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，反吴传启，反林杰，反王、关、戚、谢，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。新北大当时客观上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，主要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，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党、政干部中的“走资派”，而主要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。政治倾向主要不是反右，而是反左。

## 五、关于“黑材料”问题

关于校文革保卫组（二组）是否整过师生“黑材料”的问题。舒声在文中说：

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，但校文革的保卫组（二组）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。1967年7月10日，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，在查出的材料中，仅整“井红”的材料就有56斤重，其中有“井红反动言论集”13集，每集都有100多页……在燕南园63号的澡盆下，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，日期是67·5·6，黑体字是“反动学生的材料”，目录上列了10个人……（1967年7月26日《新北大报》第三版：“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——黑二组”）

以上舒声所言完全是不实之词，校文革保卫组根本就没有什么“黑材料”。保卫组有纪律，被禁止参加学校运动。而舒声所引用的资料，竟然是文革中“井冈山”派性小报《新北大报》1967年7月26日派斗文章中的派性谎言。过了半个世纪，舒不经核实，仍然引用当年派性小报的不实之词为根据，舒所说“黑二组”也是当年的派性语言。校文革保卫组（又称二组），业务上受公安部、市公安局领导，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及对刑事案件的侦破，根本没有师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什么负面材料。1967年7月10日，“团、零、飘”对保卫组的查封，属于破坏公检法机构的打、砸、抢极左行为。至今却被舒声认为是正义之举。由此可见文革对人的思想毒害之深远。

当年北大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在《华夏文摘增刊》2017年5月2日的《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》一文中，对当年的所谓“二组黑材料”问题有清晰的记叙和说明。谢甲林指出：

（引文略，见本刊《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》，载zk1705b。）

以上即舒声所谓的北大校文革“黑二组”整师生“黑材料”，残酷迫害“井冈山”群众的真相。

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：“井、红、团、零、飘”（“井冈山”的前身）于1967年7月10日清晨查抄北大保卫组，抢夺档案，起因于陈伯达当日在北大的讲话，他纵容、准许打、砸、抢公检法机构。而查抄出的师生“黑材料”完全是子虚乌有。还应指出，8月24日，谢甲林被“井冈山”绑架并毒打至伤，至使保卫组一度停止了工作。此事至今未见有人向谢甲林公开道歉。所谓的“二组黑材料事件”，反映了当年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想煽动与毒害之下，北大校园内派性之无理性与猖狂。反映了文革把人的思想搞乱，把人性扭曲所形成的恶果。有人至今走不出文革的迷障，表明了文革遗毒之深远。



## 六、关于聂元梓遇刺

舒声在文中说：

再如该书（注：指《抢救记忆》）记述“3月29日（1968年）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，制止武斗，聂元梓陪同。他们走到28楼‘井冈山’总部楼下时，迎面走来3、4个‘井冈山’的人，动手就打。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。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，血流了一脸，染红了上衣。后经检查、包扎，只是皮外伤。”也完全是道听途说，毫无根据。具体情况，当时在现场，后被污蔑为“刺杀聂元梓的凶手”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（见《燕园风云录》第三集，樊能廷：北大刺聂真相，6—17，蔡华江：我所见证的“刺杀聂元梓事件”，17—19），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。

舒声批评笔者“完全是道听途说，毫无根据。”这未免太武断，似乎笔者在编造故事，但笔者是有根据的，根据是当事人聂元梓在《回忆录》中的回忆。聂在《聂元梓回忆录》第271页（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）中写道：

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，流了血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，校内的两派打起来。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到学校来，帮助我制止武斗。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，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，在楼门口，迎面过来三四个人，就向我们动手。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包，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，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上，血顺着脸往下流，我的衣服上都是血。连我都被用匕首刺伤了，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？我受伤以后，包扎了一下，我就又去“请”谢富治。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，我从未进行过追究，追究他干什么？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。

以上即是我写聂元梓遇刺的根据之一，此事当时全校都知道，但我还是按受害的当事人聂元梓的记叙来写的，并非舒声所言是“道听途说”。但聂元梓的此段回忆也有不准确之处，例如聂说“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刺伤了”。据我了解，凶手并非樊能廷。因此我在书中并没讲是樊能廷刺伤聂，没讲凶手名字。但聂在那天遇刺受伤是确有其事，并非舒所言“纯属子虚乌有”。笔者所说确有其事，除了聂本人的回忆文字之外，根据之二：1968年3月29日，聂元梓遇袭遇刺时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就站在聂旁边，聂遇刺后曾靠在李的臂膀，李的头部也被打了一个包。因此卫戍区后来在北大曾追查此事，当时北大两派群众都知道此一情况。根据之三，据《北京大学纪事》（王学珍主编2008年版）记载，1968年3月29日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、北京戍区的文件：“（一）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，慰问一切被伤的人员；（二）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、打伤聂元梓、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；（三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，应立即撤出，回去作自我批评；（四）在校军事人员、支左部队，要挺身制止武斗，保护小将。各派交出一切凶器，释放一切被抓人员。”会上，谢富治批评“井冈山兵团”斗争聂元梓，说：“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？”根据之四，在7·28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会议上，毛泽东曾提及此事，对聂元梓说：“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？知道也不一定抓。算了，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。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，不要一个人乱跑。”请问舒声，以上四条根据是否属于你所谓的“毫无根据”呢？当年全北大都知道的事情，你为什么非要把它从历史的记载中抹掉呢？

根据樊能廷（化学系63级学生）本人申辩，他不是刺聂凶手，我经过调查，相信樊能廷的申辩，刺聂应是另有其人。之所以发生樊能廷是凶手的误会，因为樊当时在现场，但他手中拿的不是小刀，而是一把改锥。当时樊举起了改锥要打聂，却被人拦下，没能贴近击

中。樊能廷本人在《燕园风云录》（三）中《北大刺聂真相》一文中，说他手中拿着“一把改锥——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”（注：确有准凶器）。樊说他“看到聂元梓，不由满腔愤恨，举起改锥，隔着两、三层人要打她。”（注：樊承认有动机，有行动。）结果呢？樊说，“隔着两、三层的人，也够不着聂元梓。”“恰在此时，李将军大喊了一声什么，人群就迅速分开了。”樊便“跑回暂栖身的32斋去了。”（注：樊没能得逞，不能算是凶手，只能说是企图伤人。）误会怎样产生的呢？这就和李将军大喊那一声有关。樊能廷在上文中说，“后来听说，李将军喊叫的是‘有刺客’，或者‘抓刺客’，而且李将军的喊声似乎是我手中改锥的举起，脱口而出的。”（注：李将军不愧是军人，反应很快！）樊在上文还说，后来在追查凶手时，“李将军眼尖，指认得很真着，说是‘穿黄军装、带黑白边眼镜’，确是我当时的穿戴。”（注：事情并非空穴来风。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）

凶手是谁呢？笔者于2017年1月在北京采访了二位现场目击者校友。

1月15日，原哲学系64级学生孙厚才对我说：3月29日那天，他站在聂元梓旁边，李钟奇站在聂另一边，他看见有几个人从东边冲着聂元梓过来，有个叫樊能廷的手里拿把改锥，李钟奇马上让人把这几个人拦住。这时聂的侧后方有个人（肯定是井冈山的），刺伤了聂的头、脸，聂马上流了好多血，要跌倒，孙厚才马上抱住了聂。孙厚才的证言，说明樊能廷不是真凶，真凶是从聂的侧后方进行的袭击。

1月26日，在国政系校友丁广举、孙兰芝举办的宴会上，历史系65级校友徐森对大家讲，“文化大革命很残酷，人性被扭曲的很严重，有人变得非常暴力。3月29日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，聂元梓陪李走到32楼前，我站在聂元梓侧后。亲眼看见一个人，也站在聂后面，手拿一根细长的罗纹钢筋，一米多长，头很尖，冲着聂的头脸砸下去。好狠！聂的头、脸流了很多血，倒在李钟奇的怀里。”

凶手是谁？肯定是“井冈山”的，但始终没有查出来。由于没有死人，凶手击刺聂也并未击刺到要害，聂本人并无大碍，因此也没必要追究，后来不了了之。

从此事可看到当年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，把人群撕裂到何种程度，面对自己的师长、同学，有人竟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暴力。文革的罪恶之一，是对人性的摧残，对善良人性的毁灭。

1968年3月28日至29日凌晨，北大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，以至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于29日早晨亲自赶到北大制止武斗。武斗过程：28日晚“井冈山”武斗队首先动用武斗工具驱赶40楼的“公社”学生；随后从28日晚11时至29日凌晨，“公社”总部为避免被动，控制宿舍区，采取反制行动，出动武斗队驱赶31楼“井冈山”同学。而后，“井冈山”马上报复，赶走了32楼的“公社”同学。在两派来往驱赶、冲撞中，两派同学都有人被打、受伤。天亮以后，聂元梓、李钟奇到现场视察、制止武斗，二人竟也遇袭受伤。

当年两派武斗，两派都有责任，都错！都丧失了理智！没有正义一方。没有反抗侵略的一方。当有人拿起冷兵器，要与自己的同学、师长、同类拼杀时，他就已跨过了做人的底线！这丝毫没什么可炫耀、可得意的！时至今日，这是人们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。

七、关于周一良和高海林师生间的和解

文革时期，一切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《五一六通知》号召人民群众不但要打倒混进党、政、军及各界的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”，而且要打倒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这第二项“打倒”就是冲着高级知识分子去了。1966年8月，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，批斗“黑帮”的烈火骤然烧旺，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，也有揭发、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、教师的大字报。三院门口两侧有个对联“庙小神灵大，池浅王八多。”路过的人都能看到。后来同学间传说，李讷（毛泽东女儿、历史系65届毕业生）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，毛说应改一个字，“浅”字改为“深”字，下联改成了“池深王八多”。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，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，很快在全校传开。这一字之改，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，造成了对各系干部、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，历史系尤甚。

舒声写道：王书又说：“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，要高海林忏悔，道歉”（该书80页），也是搞错了人，喊话的不是郝斌，而是周一良先生，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，所以该书说“历经劫难之后，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”（王书第82页），也是夸大其词。

以上第一句“郝斌”“喊话”是笔者的笔误，舒的指误正确，应是周一良，后面笔者也是写周一良如何、如何。但舒声与笔者紧接着犯了同一个错误，事情的起因并不是由周一良“隔空喊话”而起，而是由周一良“托人传话”而起。“隔空喊话”则是周一良后来传递的宽容、和解的信息。

笔者在书中这样描述了师生二人和解的过程：

1998年年初，北大百年校庆将至时，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，已经工作了整30年，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，结集成书，推代表到北大请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先生为他们作序。周先生一看到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，脱口便对来说：

“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，其态度之凶恶、手段之粗暴，我是至今难忘。”“请你们告诉他，我至今不能谅解。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，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，以示鼓励。”

时隔30年了，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，就火气如此之大，可见当年高对他伤害之深。序言写过之后，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。隔了半年，1998年6月，时年85岁、因患帕金森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，烦人代劳，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《还想说的话》。他先把前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；紧跟着，对高海林的态度，周先生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，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……，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”。他接着又说：

“‘文革’这场灾难开始以后，几乎人人受害，我信了‘神’上当受骗；年轻的孩子也同样信‘神’，上当受骗。……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？因此，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：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‘相逢一笑泯恩仇吧’！”（注：周一良选集：《郊叟爆言》92页，新世界出版社）

周先生的喊话，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，并且做了回应。1999年4月，周先生曾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，当采访者顺带提及“喊话”一事的时候，周先生对他们说：“那个学生（指高海林）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，他说很感谢，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。要

到北京来找我。”（注：董正华、刘一皋主编：《中国留美学人口史：周一良访谈录》19页）

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，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，张口就说：“这个人左得很。”他与我的印象相同。但在我的印象中，高海林在文革中也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亮点。1967年7、8月在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反军高潮时，高海林曾以新北大公社“炮兵营”战斗队的名义前后贴出两篇大字报：一论、再论《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》，虽然该大字报喜欢用“大树特树”、“绝对权威”这类夸张、绝对化的概念，但他当时在全国反军狂潮的形势下，确有一种反潮流，坚决捍卫长城的气慨，旗帜很鲜明。周一良老师说当年师生们“同样信过神，上当受骗。”这也应是由衷之言。周一良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成员，成为“四人帮”的御笔，是他痛悔之事。历经劫难之后，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。

以上即笔者书中原话，这是“夸大其词”了吗？

“相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是周教授对高海林喊话和解时引用鲁迅先生的话，高海林不久与周老师通了电话，师生之间“一笑泯恩仇”。高海林还说要到北京找周教授，后来二人是否见面？不得而知。但“相逢”似不必机械地去理解和较真吧？

郝斌老师对周一良和高海林师生之间的和解之事有一评论，很中肯，郝老师说：“道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听说，高海林在河南某大学教书，授业认真，口碑不错。……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，也有悔恨，但他只是自侮自恨，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，直到周先生的喊话入耳，他才把包袱放下。”

郝又说：“‘文革’中的整人，是个社会问题，整人和被整，涉及了一干人众。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，才把许多人推上了暴力的平台。如今，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，把整人者和被整人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宽容平台，才是正理。”（注：郝斌：《截屏一瞥周一良》）

我很赞同郝斌老师以上的评论。请问舒声：你是否赞同：大家应共同来搭建和解、宽容的平台？而不是一味宣扬对立和仇恨？

## 八、关于牛辉林

牛辉林曾经担任北大“井冈山兵团”第一把手，当时是位较激进的同学，他所领导的“红旗飘战斗队”，被很多同学认为是“井冈山”里最左的一翼。有人曾发现牛当时有反周（周恩来）的问题，但舒声却为之辩护。舒在文中说：

例如该书写道：“在1966年6月中旬，哲学系66成员”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两人找我，他们表情严肃，告诉我，他们在“红旗飘”总部办公室窗外，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。牛辉林分析：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，周恩来到处救火，灭火，保护老干部，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。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。他们要反聂，反周，造反到底（这就是牛辉林“红旗飘”秘而不宣的纲领）。（该书165页）。且不说文中所说的1966年6月的时间不对，那是还是工作组时期，“新北大公社”和“红旗飘”根本没有成立，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，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，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？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，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？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“秘而不宣的纲领”，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？

以上舒文指误的时间是正确的，不是1966年，这是笔者笔误，应是1967年6月中旬发生之事。至于舒以牛住三楼宿舍为由便否定牛的“形势分析”，则太牵强、无力了。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，群众的战斗队那有什么固定办公室，开会商量事可能是任何成员的宿舍。“红旗飘”有十几名成员，有住一楼的，难道不能在一楼房间开会吗？

我判断牛辉林有“秘而不宣”的反周纲领有以下根据：根据之一，我确实有消息来源（赵、史二人向我报告）；根据之二，当时关于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之说，关于“新北大”、聂元梓是新的“保守派”（保周）之说，曾在地派中极端派流行，而牛则称得上是“井冈山”及地派中的极端派、激进派；根据之三，我毕业后曾于1971年应历史系领导邀请，回历史系讲述1967年极左狂潮，讲了牛关于反周的“形势分析”，原“井冈山”的教师无一人质疑，说明他们有正常、合理的判断；根据之四，1971年北大在“清查五一六”的运动中，3月4日牛辉林在全校坦白大会上公开坦白、承认自己是“五一六分子”，说自己“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”。他当然不是五一六分子，这是给自己扣了个冤案，但他有没有“打倒周恩来”的“五一六思想”呢？是否心虚顶不住了呢？根据之五，就是牛辉林1967年的“8·9反军报告”，他公开点名，矛头直指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叶剑英、陈毅、徐向前。根据之六，当年牛辉林、“井冈山”攻击聂元梓、“新北大公社”是“新的保守派”、“最大保皇派”，那么“保”谁了？不可能是保陆平、刘、邓吧。到底是指“保”谁了呢？当年不能公开说，但两派的领导和部分群众都心知肚明嘛！

以上五条根据中最重要是第一条：消息来源。当时笔者是“新北大公社”“66串联会”总召集人。哲学系“顶风船”战斗队是“66”的骨干战斗队之一。“顶风船的队长赵春福（文革后任北京市委高级党校校长）和史新国两人找我，非常郑重、严肃地向我汇报，汇报他们所听到的牛辉林对形势的分析。我们三人讨论后取得共识，认为牛辉林说周总理是旧政府代表，是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潮，是分裂中央。总理是好人，“公社”要坚决保周。

舒声在文中不肯引用笔者判断的根据。笔者引用书中有关部分内容如下，请读者分析、判断。

在1967年的3月至8月，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。牛辉林所谓的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、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，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。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。聂元梓在她的《回忆录》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。聂说：“一九六七年六月底（或七月初），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‘东方红’（地派），见到了许维纲，许维纲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，他的主要观点是：‘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。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，你们站在了总理一边’。”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、地两派的本质分歧，但“不是所有单位、所有群众都明了。”“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。”（注：《聂元梓回忆录》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16页）做为过来人，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。当时，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。但牛辉林并没有公开讲出他的观点，只是把聂元梓、“校文革”、“新北大公社”做为“新的保守势力”、“老保”，进行打击。牛所说“公社”一派是“老保”，到底“保”谁了？牛没说出口而已。但这种根本分歧，“公社”与“井冈山”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瞭。（注：当年的舒声可能也不明瞭。）

我毕业后，北大在1971年清查“5·16分子”时，“红旗飘”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。春节时，历史系领导张万仓老师突然到我北京家里找我。他想到春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。他让我到北大历史系给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讲“5·16”的问题。我于是应邀到北大历史系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了1967年6、7、8月

北京市、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，讲了“5·16分子”是三反，反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反军，反周。讲了“红旗飘”成立不久，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，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就是反周，讲了我的消息来源。

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、“红旗飘”是反革命，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。依我对当年“清查‘5·16’反革命集团”运动的观察，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，后来发展成全国规模的“秋后算帐”，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。在中央上层，是毛、周联手进行清算。毛泽东打倒政敌刘、邓的目标已完成，造反派已无利用价值。周与毛在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。毛泽东、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政领导系统，需要扫除障碍，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，于是便联手“秋后算帐”。

真正的“5·16兵团”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，对此中央文革有调查员的报告。可是全国竟然抓了300多万“5·16反革命分子”，是文革后期的一大冤案。“5·16”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。

以上为笔者在拙作168至170页的内容。

最近，笔者看到校友、原“红旗飘”成员屈长江的回忆文章《良知漫漶的岁月》（《燕园风云录》四）文中屈长江承认当年“红旗飘”中存在着“有一种理论叫‘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’。”（第58页）但屈没有深入详谈。有关真相，希望有人能进一步揭示和佐证。

#### 九、关于乔冠华为王福时写的证明

舒文写道：“该书第7页：‘1986年9月，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，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，是由乔冠华、刘思慕、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，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工作，是从在美国发行《远东通讯》算起。’经查，乔冠华是1983年逝世的，怎么可能在1986年为王父出证明呢？”

这是件小事，且与北大文革无关，但笔者却不得不讲清楚。因为按舒声的说法，笔者似乎有编造故事的嫌疑。首先笔者并没说乔冠华写此证明的时间是1986年9月，而说的是父亲王福时离休的时间。单位里每个人退休、离休时间不同，在每人离休或退休之前很早一段时间，人事科便要普遍内查外调，确定每人的“参加革命工作”的时间，以便确定离、退休的待遇。对老干部身份、资历的鉴定，会开始的更早一些。这本是常识，但舒声却要先歪曲笔者关于乔写证明的日期，然后断定不可能有此证明，使笔者感到这是舒声有意要污化原对立派校友，指责笔者似乎造假。我对舒这样的文风，实在不敢恭维。舒声如真想认真考证乔冠华出证明一事真伪，去一趟大百科出版社人事科调查、询问，不就明白了吗。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写《证明》的日期是：1983年1月23日。《证明》全文如下：

#### 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

刘尊棋、刘思慕二同志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材料所说情况均属实。

“远东公报”（英文）系我党领导下在香港出版对外宣传刊物。1948年至1949年，王福时同志在美国旧金山为该刊翻印发行。从1948年秋至1949年秋，在香港我党对外宣传是我负责。

乔冠华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三日

（注：“远东公报”即在美国发行的“远东通讯”。）

以上是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手写的证明材料，其复印件，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档案馆内的《王复兴专档》之中的《王福时卷宗》内。档案中，乔为王福时写的《证明》，是乔冠华手迹的复印件。

#### 十、几个小问题：

1、笔者在书中有两个人名写错了，109页“谭立夫”应是“谭力夫”；99页“樊立群”应是“樊立勤”。感谢舒声的指正。

2、舒声指误“第210页，说‘东总’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、于毅夫是统战部长，都有误，他们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。”舒此处指误，一对一错。于毅夫确是统战部副部长，不是部长。但刘澜波文革前是任过正部长的，是电力工业部部长，任副部长是在水力电力部的任职。

3、舒声以下指误不对。舒说：王书“第43页：‘那时（1966年6月）北大校园内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，有卖茶叶蛋的、煮花生的、热包子的。按现在说法，有点像大型嘉年华。’实际情况是上世纪60年代，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，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，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，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，鸡蛋、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，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。”笔者这段描述涉及当时的真实社会情景。实际情景是当时确实存在卖零食的小商贩。北大当年处于郊区，四周有许多农村，有许多小商贩不奇怪。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《农业六十条》后，农村是允许农民保有自留地并自养家禽，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的。割城乡资本主义尾巴是文革中期1970、1971年“一打三反”时的事情了。但这个“尾巴”极其顽强、始终也割不清。否则就不会出现80年代初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的“包产到户”了。舒声认定1966年6月时北京海淀区不存在小商小贩，这不符合实际。笔者当年就经常在傍晚于校园内，花几分钱向推车的小贩买茶叶蛋吃。舒声在此处犯了想当然的教条错误，且所述教条亦错。

4、舒文第1页写到“李清昆”，名字写错了，应是“李清昆”。

5、舒文第1页引用《抢救记忆》第35页的一句话，引用错了。原文是：“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。”不是“预言”。把“预演”写成“预言”，读者看不懂了。

6、舒文第3页引用《抢救记忆》第191页一句话，引用错了。舒文写道：“该书还说：‘当年聂元梓、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、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，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，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，’……。”舒文增添了“重点”二字，句子不通了。

7、舒文第四页讲第三个大问题，引用《抢救记忆》关于牛辉林“秘而不宣的纲领”之内容时，写错了引用该书的页数，写成了“165页”，不对，应是“168页”。此外，舒文把原书原文“赵春福、史新国”二人名字，写成了“赵某某、史某某”。笔者在原文写了二人真实姓名，是为着还原真实历史。舒却把原文篡改了，用“某某”代替名字，显然是为了模糊事情的真实性的真实性，不可能是笔误，应是有意为之。

舒文仅 8 0 0 0 字，出了以上许多错误。舒声批评笔者“由于不严谨出的错，更是不胜枚举。”感谢舒声的提醒。让我们共勉，今后行文注意更严谨、更认真，并更仔细校对吧。舒声对拙作的正确指正，笔者将在拙作再次印刷时，予以纠正。

2 0 1 7 年 6 月 1 日

---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本期编辑：   | 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 | 《CND》总编： |
| 华新民（美国） | 思语（美国）      | 陈天寒（美国）  |

《华夏文摘》网址：<http://www.cnd.org/>，国际刊号 ISSN 1021-8602  
投稿专用地址：[tougao@cnd.org](mailto:tougao@cnd.org)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[cnd-cm@cnd.org](mailto:cnd-cm@cnd.org)

---